

迷失与救赎

——论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胡中方

(镇江高等专科学校 基础部, 江苏 丹阳 212300)

摘要:处在清末至五四的历史大潮中,鲁迅清醒地看到了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他用小说,以生动的人物形象反映当下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迷失。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多是彷徨于明暗、新旧之间,游离于两个社会、两种文化之间的多余人。在鲁迅眼中,知识分子只有构建独立自强的理想人格,启蒙并引领大众,中国才能全面立人然后自立,知识分子也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我救赎。

关键词:鲁迅;知识分子;理想人格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22(2011)03-0056-05

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作为启蒙先锋出现于思想文化界,知识分子题材亦成为五四小说的热门。鲁迅《呐喊》和《彷徨》两部小说集共25篇小说,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占15篇,可见鲁迅对知识分子的关注程度。鲁迅在有限的篇章里刻画了知识分子的诸多类型,几乎囊括了五四前后新旧知识分子阶层的全部构成。鲁迅亲身感受着知识分子的沦落,同时也感受着他们的执着,其小说中的知识分子都在人格的迷失与自我救赎中游走。

一、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迷失

“知识分子”一词源于西方,“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1]根据西方标准,中国古代的士正是承担着文化使命的知识分子阶层。

士阶层源于先秦时代。孔子对士作了规定:“士志于道”。孔子弟子曾参对士作了进一步规定:“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儒家以道自任,强调士的价值取向必须以道为最后依据。所谓“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知识分子所当考虑的乃是道的得失而不是个人的利害,这里

的道,相当于一套儒家价值系统,士是儒家基本价值的维护者。

儒家人格是中国人格理想的核心,导引着千年来士人的精神追求。从先秦的孔孟,到汉代清流李膺、陈蕃、范滂;从魏晋南北朝“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名士阮籍、嵇康,到隋唐的大诗人杜甫、韩愈、柳宗元;从宋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到明代“事事关心”的东林党人。他们以“内圣外王”、“孔颜乐处”的圣贤气象,“重义轻利”、“自强不息”的君子之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努力从个体的伦理道德修养层面严格要求自己,献身国家民族事业,维护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他们实践着“圣贤”、“君子”、“大丈夫”的人格理想,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极其珍贵的优良传统。

可惜宋明之际,随着封建制度的僵化,儒家人格理想的负面内涵日益上升,人身依附、尊卑上下的病态人格,与帝王的独裁、宦官的阴毒、外戚的跋扈、群臣的阿谀,彼此纠结,互相作用,将中华民族的生机与活力绞杀殆尽,同时也把东方型的病态人格推向极致。

面对僵化窒息的传统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横空出世,李大钊在《精神解放》中指出,“一切解放的基础,都在精神解放”^[2]。陈独秀在《青年杂

收稿日期:2011-05-20

作者简介:胡中方(1975-),男,江苏丹阳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和语文教育研究。

志》发刊词《敬告青年》中开宗明义也提出自主自由人格解放,胡适则借助对易卜生戏剧的阐释,大声呼唤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

五四新文化运动标志着思想的启蒙,人格的解放。处在这样一个历史大潮中的鲁迅清醒地看到了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他用小说,用人物形象来反映当下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迷失。

1. 封建统治者的人格依附形象

封建统治者的人格依附形象主要有两类,分别是封建礼教卫道士形象和受科举制度毒害的封建制度的祭品形象。

鲁迅笔下的封建假道学、卫道士形象很多,如《肥皂》中的四铭、《风波》中的赵七爷、《高老夫子》中的高尔础、《祝福》中的鲁四老爷等。他们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不学无术。作者对他们进行了辛辣的批判和嘲讽。

《肥皂》中的四铭曾是“提倡开学堂”的维新派人物,但不久便开了倒车,猛烈攻击新文化。作者用讽刺的手法,暴露了其隐藏于道貌岸然的外表下灵魂深处的污秽。他指责新学堂学生“没有实学,只会胡闹”,自己却不懂女学生骂他的英语“恶毒妇”(老傻瓜);他指责无赖不该侮辱女乞丐,自己却怀着猥亵心理给太太买了块肥皂;他教训儿子要学好,自己却在吃饭时同儿子争着伸筷“去夹那早先看中了的一个菜心”。《风波》中的赵七爷,是“这三十里方圆以内的唯一的出色人物兼学问家”,背负着保皇忠君的沉重的历史包袱,对于颠覆传统秩序的革命行为有着一本能的反感,对于敢借革命之机剪掉辫子的七斤有着一一种莫名的嫉恨。《高老夫子》中的高尔础也是复古派的人物,原是一个名叫高干亭的流氓赌棍,他身上没有四铭那种绅士的虚伪,却有市侩和无赖之徒的浅薄。来女校之前,他同老钵、黄三之流“一同打牌,看戏,喝酒,跟女人”。他怀着“看女学生”的目的去女校上课,却因不学无术和精神的过分紧张,竟不敢往台下看,由于实在无法把课讲下去,他只得又恢复了其流氓赌徒的“旧业”。这些以道德文章自居的封建卫道士,其实是一些不学无术、灵魂卑污的伪君子。

隋唐以后,科举制度成为取士的重要途径,读书人视科举为进身的阶梯,以悬梁刺股、囊萤映雪的精神,饱尝数十年寒窗之苦,将命运押在科举考试上。少数人爬了上去,从此一跃龙门,光宗耀祖;而对于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到头来得到的只

是满头白雪,两袖清风,低下的地位,清贫的生活。《白光》中的陈士成、《孔乙己》中的孔乙己就是这类读书人的代表。

老塾师陈士成参加科举考试,考了十六回,回回落榜,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童生”,最终却连秀才都没有捞到,他一生的梦想是科举致仕,高官厚禄。受到多次打击,终不死心,想在自己的房子里挖出祖宗埋下的金银珠宝,一夜暴富。这种狂热的幻想导致他精神失常,落水而死。孔乙己虽读过《四书》、《五经》,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好吃懒做;他既不能跨进阔人之列,又不愿与“短衣帮”为伍;他虽穷困潦倒,却总是以“君子固穷”来自我解嘲。鲁迅写出了他被人当作笑料,没有人格尊严、没有地位的精神孤独。陈士成、孔乙己是那个时代可怜的祭品。作为启蒙者的鲁迅,以敏锐的眼光洞察到了封建礼教、科举制度是摧残知识分子思想、人格乃至人生的精神枷锁。“孔乙己、陈士成的悲剧则在于他们把个人的全部追求都纳入到封建伦理秩序为他们规定的人生模式之中。”^[3]在封建意识的浸淫与毒害下,处于封建社会末世的知识分子便在无形中消解了本我的存在,成为了封建统治者的人格依附形象。

2. 觉醒的时代先驱者、叛逆者形象

他们是早期的社会改革者,是觉醒过来的进步知识分子,《狂人日记》中的狂人、《药》中的夏瑜、《长明灯》中的疯子就属于这一类。

《狂人日记》描述一个逻辑混乱,时时害怕被吃掉的“狂人”。他从“歪歪斜斜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的历史“字缝里”看出“吃人”两字。他发现了他们的吃人方法“大家联络,布满了罗网”,而且这罗网是由“互相劝勉,互相牵掣”的“父子兄弟朋友师生仇敌和各不相同的人”组成的,尖锐地揭示了家族制度的本质。狂人是一个封建宗法社会的叛逆者和具有初步民主主义思想倾向的进步知识分子形象。作品通过这一迫害狂患者形象,传达了一种思想、一种反封建的力量、一代觉醒的知识分子对历史和社会的重新认识。

《药》中的夏瑜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第一个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形象。鲁迅对众多的生活原型进行了广阔的艺术概括,秋瑾、徐锡麟、陶成章、邹容等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形象经过作家典型化的艺术处理,集中而强烈地体现在了夏瑜这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身上。他说“这大清的

天下是我们大家的”,显示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者的坚定信仰。夏瑜为这一信仰而慷慨就义,他的流血牺牲被城市贫民华老栓换成为儿子治病的“人血馒头”,结果令人悲痛。百姓愚昧麻木,他们对夏瑜革命行动的否定,消解了烈士慷慨赴死的意义。烈士的呐喊和反抗成为了庸众无聊生活中的谈资。启蒙者的牺牲与鲜血治疗不了小栓的疾病,更不能唤醒在铁屋中沉睡的中华民族。

《长明灯》中的“疯子”是个孤独的叛逆者。他生活在守旧的、充满迷信思想的吉光屯。这个屯之所以被称为“吉光屯”,是因社庙里点着一盏“琉璃灯”。吉光屯的百姓都相信全屯人的命运和这盏长明灯紧密相连,灯一灭,就会屯变海,人变泥鳅。他们把“长明灯”看成命根子,拼命维护。在迷信的村民中,“疯子”是一个叛徒,他敢于离经叛道,想把象征封建传统的“长明灯”吹灭。“疯子”反封建的思想行为,虽代表群众利益,但却不为群众所理解。启蒙者最终被被启蒙者吞噬,其中蕴含着透骨的悲凉。

3. 曾经热情,而后沉沦的孤独者形象

随着五四运动的退潮,新文化统一战线分化,知识界弥漫着苦闷的情绪,“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1920年至1922年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4]

《端午节》第一次透露了五四运动退潮引起的知识界思想消沉的信息。主人公方玄绰是一位北洋政府统治下,以清高自居,又以清高自误的知识分子形象。方玄绰是新文学营垒中的一员,但并不激进,他有着教育部任职和学校任教的双重身份,对社会现象抱有不平,但又不敢向社会公然抗争,“差不多”是他的口头禅,对老辈威压青年,兵士打车夫,不再愤愤不平,对同僚的索薪,袖手旁观。随着五四运动的退潮,愈来愈陷入调和折中、随遇而安的思想泥潭中。

《在酒楼上》与《孤独者》叙述的是在现实逼迫下知识分子不得不痛苦地放弃理想的故事。吕纬甫和魏连殳是辛亥革命后至“五四”落潮期由叛逆而趋于彷徨沉沦的知识分子典型。《在酒楼上》里的吕纬甫原本敏捷精悍、思想开放、热心改革。他曾连日议论改革中国的方法,曾到庙里拔神像的胡子,但终究逃不脱蝇子式的圆圈,被生活逼迫成了一个敷衍麻木的人。为了生计,他违心地去教自己曾经反对过的“子曰诗云”、《女儿

经》。他最终走向了沦落:“以后?——我不知道。……连明天怎样也不知道,连后一分……”。由于陷入了彻底的绝望与虚无之中,他不再有对希望的追寻,对生命意义的追问。

《孤独者》里的魏连殳出外游过学,被称为“异类”新党。他孤独冷漠,看不惯一般的庸俗之人,不愿同流合污。他受着流言蜚语的攻击,受着失业、贫困的胁迫。到屈辱得活不下去的时候,魏连殳便“躬行了先前所憎恶的一切,所反对的一切。”抛下自己先前的理想,做了杜师长的顾问。从此以后,魏连殳贵客盈门、高朋满座,得到了“新的馈赠与颂扬”,然而魏连殳却对此感到恶心与厌恶,为之失眠、吐血。魏连殳看起来风光了,胜利了,成功了,可他却认为“现在才是真的失败了”,在周围的一片胜利中,他独自咀嚼着悲哀,吐血而死。小说表现出魏连殳这类曾经受过民主、科学的教育的知识分子,在辛亥革命之后的现实社会中步步受阻、时时碰壁的真实生活。

《伤逝》里的子君和涓生生活的时代大约晚于魏连殳、吕纬甫十年左右。子君和涓生都是五四青年,他们身上深烙着时代的印痕。他们有知识,有理想,正直,敏感,追求个性解放和爱情自由,子君勇敢地冲出了旧家庭的藩篱,她大胆说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样惊世骇俗的话语。但建立小家庭后,便使用全部的精力忙于烧饭做菜,养油鸡,喂阿随。当涓生失业后,她们的爱情破裂,就经不住打击,又回到她曾经挣脱出来的家中。涓生最后只能在悔恨中觉醒、反抗,再去寻找新的生活,新的道路,新的希望。涓生子君上演的其实就是五四以后许多青年男女的悲剧。

二、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救赎

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不管是四铭、赵七爷、孔乙己、陈士成,还是狂人、夏瑜、吕纬甫、魏连殳、子君、涓生,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悲剧结局。“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5],这“梦醒了无路可以走”的苦痛,正是鲁迅对于知识分子命运的切肤的痛感。鲁迅揭示知识分子灵魂的小说,都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的悲剧。

四铭、高老夫子等人虽然处于小群体的统治地位,掌握着群体话语权,养尊处优、饱食终日。但他们其实也有自己的“远大抱负”。四铭意识到自己挽救社会道德的使命;鲁四老爷家里放着

理学名著和儒家经典,以此作为自己的人生准则;高老夫子发表了《论中华民国皆有整理国史之义务》的名文,并为女学堂的道德状况而深感忧虑;赵七爷处处维护皇权的威严。随着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一系列革命运动的出现,在中国延续了数千年的封建帝制统治被推翻了,代表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体系坍塌了。四铭、鲁四老爷等人虽想极力维护封建皇权及封建伦理道德,但已经力不从心、无可奈何了。面对时代激变、世风日下的社会现实,他们胸无一策,他们从社会的支柱演变成了社会的丑角。

作为在封建科举制度下的落第文人,陈士成、孔乙己等人更为潦倒,他们食不果腹、衣不保暖、无人同情、无人理解。陈士成陷于精神狂想而投水自杀,孔乙己更是在受尽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后走向了人生末路。二人都走的是一条传统封建社会的读书做官之路,他们是封建旧秩序、旧道德、旧文化的追随者,愚昧、不觉悟,至死都不明白科举制度只不过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驭人术而已。他们以丧失谋生的手段和立身处世的资本为代价,甘愿在“四书五经”中耗尽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孔乙己的悲剧正是一个善良的读书人被他自己所虔诚信奉的封建思想和衷心拥护的科举制度愚弄以致毁灭的悲剧。”^[6]身处平民世界却在思想上把自己定位于统治阶层的一分子,维护封建制度、封建伦理道德,这是孔乙己、陈士成们最大的悲哀。

狂人、夏瑜、吕纬甫、魏连殳、涓生、子君等是鲁迅笔下的叛逆者形象。他们是革命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民众的启蒙者,都曾经觉醒过,抗争过。他们接受了新文化的洗礼,走在了群众的前列,但群众愚昧麻木,和他们之间有着天然的、无法调和的矛盾与隔阂。作为旧社会的“异类”,他们备受环境的压迫与围攻。作为时代先驱者,他们却绝少拥有优越感,有的只是孤独和痛苦。他们陷入了个人生活困顿和社会价值迷失的双重危机,陷入了“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困境。狂人的病被治好、欣然赴任,做官去了;革命者夏瑜作为民众的启蒙者,最终却被民众吃掉;吕纬甫从一个敏捷精悍、富于激情的青年沦为了一个行动迂缓、颓丧消沉的庸人;魏连殳在绝望中违志逆行,自暴自弃,走向了对自我肉体生命和精神生命的自戕;美丽勇敢的子君最后不得不回到父亲那里,在冷眼中抑郁而死。自私的涓生虽然摆脱了子君,但迎

接他的只有贫穷、以及终日的悔恨与痛苦。

知识分子自身的各种弱点,如自私软弱、贪图安逸、爱慕虚荣等又在不同程度上加速了悲剧的发生。涓生缺乏一种抗争和开拓的勇气,他把和子君的爱说成是盲目的爱,把爱情和事业的矛盾看得不可调和,把造成婚后困境的责任完全推给了子君,折射了他的虚伪、软弱和动摇。正是他的精神弱点导致了子君和他们爱情的“伤逝”。吕纬甫明知迁葬是虚妄的却仍尽心竭力地为之劳作,其中蕴含了他的一种生命的无聊感和匮乏感。方玄绰向金永生借钱被拒,先是“慨然”,而后就“无怪其然”了。因为他自己也曾谎称领不到薪水,打发走前来求助的同乡。茅盾在1927年11月《小说月报》上发表的《鲁迅论》分析得极为精辟,以为《端午节》的表面虽颇似作者借此发泄牢骚,但是内在的主要意义却还是剥露人性的弱点……在这里,作者很巧妙地刻画出‘易地则皆然’的人类的自利心来;并且很坦白地告诉我们,他自己也不是怎样例外的圣人(见1927年11月《小说日报·鲁迅论》)。他指出了鲁迅作品的深刻之处——在洞悉人物内心的同时毫不留情地解剖他们。

鲁迅小说中知识分子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社会与时代的悲剧,他们既不满于旧时代,又看不到新希望,他们苦闷孤寂,彷徨于明暗、新旧之间,成为游离于社会的零余者。他们也曾满怀希望、也曾付出努力,但在翻涌的时代浪潮中,这一切都显得苍白无力。他们最终不得不放弃梦想、放弃自由,变得庸俗卑怯、彷徨颓废。表面上,他们妥协了,实质上,他们仍在用病态的方式继续着畸形的反抗。“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依恋,与我都没什么关系了。”《在酒楼上》中,“我”道出了这种难以言说的悲哀,一种无家可归的深沉的漂泊感和孤独感。

鲁迅在其小说的知识分子形象身上展演着自己的喜怒哀乐,为他们的迷失,为他们的庸俗卑怯、彷徨颓废深感心痛和悲哀。同时,鲁迅也在其小说的知识分子形象身上丰富着自己的“立人”思考。早在1907年前后,鲁迅就写下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一系列文言论文,以超前的高度,提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建构问题。他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大声疾呼:“今索

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7]“精神界之战士”即鲁迅眼中理想的知识分子形象。他在《文化偏至论》中主张:“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8]58}鲁迅开创了他独具一格的“立人”观:“掇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8]47}，“若夫非物质者,犹个人主义然,亦兴起于抗俗。”^{[8]54}鲁迅眼中的知识分子理想人格是能“争天抗俗”，敢于反抗传统、反抗既成的现实，敢于同庸众对立的“精神界之战士”。鲁迅的“立人”观有极强的知识分子精英意识，他认为中国

要独立自强，首先在于中国人要有独立自强的意识，而这种意识必首先发源于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知识分子群体的独立自强意识又依赖于其中先知先觉的精英个体思考和呼吁。先知先觉的精英们不懈地“启蒙”和“排俗”，以他们的人格力量影响并引领知识分子群体，再由知识分子群体影响并引领大众，自上而下，中国于是全面立人然后自立。在鲁迅眼中，知识分子只有培养自己的健全人格、踏踏实实地做好对普通民众的思想启蒙、一点一滴地改变社会，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我救赎。

参考文献:

- [1] 余英时. 士与中国文化[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2.
- [2] 李大钊. 李大钊文集第三卷·精神解放[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173.
- [3] 汪晖. 反抗绝望[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135.
- [4] 鲁迅. 鲁迅全集第六卷·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253.
- [5] 鲁迅. 鲁迅全集第一卷·娜拉走后怎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167.
- [6] 史志瑾. 鲁迅小说解读[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29.
- [7] 鲁迅. 鲁迅全集第一卷·摩罗诗力说[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102.
- [8] 鲁迅. 鲁迅全集第一卷·文化偏至论[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Lost and Redemption

——The Intellectual Image of LU Xun's Novel

HU Zhong-fang

(Fundamental Department, Zhenjiang College, Danyang Jiangsu 2123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late Qing to the historical tide of May Fourth, LU Xun to clearly see the intellectual difficulty of life, with his novels, characters reflect the confusion of ideal personality of contemporary intellectuals. Intellectuals in Lu Xun's novels, was wandering in the dark, between old and new, free in both social, redundant between the two cultures of people. In the eyes of Lu Xun, intellectuals only the construction of ideal personality of independent self, enlightenment and leading the mass, people of China to full State and then independence, intellectual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true sense of self - redemption.

Keywords: LU xun; intellectuals; ideal personality

(责任编辑: 李开玲)